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2 2004
(第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4)

《棋王》中叙述者与叙事主体的相互较量与融合

李 燕

(华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作家阿城在《棋王》中以叙述者"我"逐步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和叙述主人公王一生的棋道与处世之道,通过表层结构"我"从寻道到悟道的过程逐步揭示出深层结构中叙事主体的价值取向,使文本中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在相互较量和征服中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这种叙述方式使文本体现出深层的内涵并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关键词: 叙述者;叙事主体;深层结构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4)01-0127-05

从文本的表层结构来讲,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主要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对"棋呆子"王一生在"文革"时期的人生经历的叙述,展现了王一生的人生见解和精神特质,因此小说中除了王一生的故事,还有一个叙述者"我"的故事,正如阿城自己所谈的关于《棋王》的叙述者:"《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另外一个就是我,'我'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1]读者是通过"我"的角度和眼光介入作品中的世界,然而作为叙述者的"我",归根结蒂又是受制于在其背后的叙事主体即文本中隐含的作者,这个叙事主体存在于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控制和影响着表层结构中的叙述者("我")和叙述对象(王一生)的故事,因此叙事主体从困惑到超脱的历程是通过表层结构中的两个主体的逐渐消弥和价值取向的趋同来得以展示的,这种叙述方式使读者在与"我"感同身受的探寻和思考中领悟到作品的深层内涵。

阿城在《棋王》的叙事手法上采用了现代小说的叙述方式,即第一人称兼次要人物的叙述方式,"主人公是一个有魅力的,但行动和心理都比较神秘的人物,而叙述者则是一个既能有机会与主人公接近,却又在智力上,想象上都近于常人(也就是说,近于读者)的人物。"[2]从叙述者的角度看,《棋王》的叙述者又叫"有限知觉叙述者",其感知能力和叙述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叙述者虽然以叙述行为人身份出现,甚至本身就是事件的参与者,但他比人物知道得更少,就象一位冷眼旁观的"目击者",只能叙述人物的所见所闻,却不知道也不叙述人物的所思所想,不进入任何人物的意识领域,因此呈现出来的往往是表层的结构和意义,也正是这种有限的视角使文本充满了探寻深层结构和意义的可能:叙述者"我"在文本的表层结构中以常人,朋友和悟道者三种逐步提升的境界展现了叙述者与深层结构中的叙事主体逐渐融合的过程,并以"我"最终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完成了叙事主体的寻道历程。

收稿日期:2004-01-11

作者简介:李燕(1973-),女,湖北黄冈市人.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常人叙述者看“呆子”

《棋王》中的“我”是王一生的亲密朋友,但最初认识棋王王一生时对他的了解甚为有限,只是因为他的种种怪异之举而对他产生了好奇:《棋王》开篇是阿城苦心经营的神来之笔,火车快要离站,整车的知青都在与亲友哭泣告别,只有“我”和王一生独坐在车厢里,表面的相同却正好显示出态度的不同。“我”因为走资派的父母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无人相送,于是叙述中的反讽语调暗示了“我”对混乱时局的强烈憎恨和否定:

>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准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冷峻的语调中流露着愤世嫉俗的心态,并预示着“我”在人生困境之中开始消极而迷惘地寻找人生的意义,“我”也因意识到自己存有一份玩世不恭的清醒而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与此相反的是在这个特定的氛围中,王一生并没有挥泪告别,而是在纷乱之中邀请“我”与之下棋,因为他对插队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因此在“我”的眼中,王一生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与众不同,然而这种不同却是以“我”和其他人眼中的“呆”来得以彰显的,因此“我”始终是用调侃和揶揄的语气来表现对他的不认同,如在火车上听到的王一生这个棋呆子不解人事、有违时尚的呆人呆事;王一生所讲的老掉牙的“节约粮食”的故事;以及对“我”如何混吃的细节不厌其烦地打探等等,尤其是对王一生在火车上“惨无人道”的吃相描写实在让人刻骨铭心:

> ……听见前面大家拿吃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的。果然,呆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节慢慢地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

应该说这种略带刻薄的叙述语调反映出“我”以常人叙述者的身份看呆子棋王时并无太多欣赏之情,对其人其事并不认同,但与此同时他的呆人呆相却莫名地引起了“我”的同情、理解直至喜

欢,两人的情感取向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于是我们可以觉察到:“我”在叙述中所运用的一系列反语与隐藏在叙述者背后的叙事主体之间存在矛盾。“布斯把叙述者分为‘可靠的’与‘不可靠’两种类型。……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如果二者发生冲突,叙述者的态度就是值得怀疑的。”[3]正是这种怀疑使我们感觉到隐含的作者即叙事主体的存在,并生出疑惑:常人叙述者“我”背后的叙事主体与主人公王一生的精神联系究竟是什么?并随着文本的深入去追寻它在深层结构中所要表达的的真实涵义,整个文本也因此充满了可读性。

二、朋友叙述者看王一生

如果说常人叙述者‘我’与王一生在最初结识中的表面不认同让读者意识到叙事主体的存在,那么随着故事的发展,朋友叙述者‘我’则力求与叙事主体所追求的价值标准趋于一致从而使叙事主体得以彰显。

故事的进展仍以‘我’同王一生之间的联系而展开,分手几个月后的一天,王一生来访,“我”与王一生似乎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王一生说:“你们这些人哪!没法儿说,想的净是锦上添花。我挺知足,还要什么呢?你呀,你就叫书害了。……你不错,读了不少书。可是,归到底,解决什么呢?”而我也反问他:“你觉得一切都好,干吗还要下棋呢?下棋不多余吗?”这种貌似对立的谈话表现出的却是一种相同的价值取向:“人还是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只不过精神寄托的对象不同而已,因此叙述者与叙述对象表面上的分歧表现出的却是内在的精神联系,逐渐呈现出与叙事主体的价值取向融合的趋势。当‘我’和王一生谈起现状时,“我”同意王一生‘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的看法,可又于心不甘,“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在这儿,“我”明白地告诉读者:“我”一直在思考探索‘活着’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独自思索,没有结果,而当王一生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却以他精神上的通达和极具道家气息的处世之道给‘我’以极大的启发。

在农场中,王一生曾向‘我’谈起他轻易不向外人道的、令人心酸的母亲和家庭,“我”的叙述语气已经完全由原来的调侃变成温和,进一步的了解了“呆子”不呆的内在智慧和真正品格。王一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整个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全家生活费每人平均不到十块钱,为省家用,他连上公园、看电影等学校活动也取消了。从小体会到生活艰辛的王一生直觉地认识到‘生命’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能维持和延续的,他牢记母亲的话:“你在棋上怎么出息,到底不是饭碗。”因此对于“吃”格外的虔诚和精细,王一生所说‘一天不吃、棋路就乱’的话语,朴素地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但“生不可太胜”,知道衣食是本但不成为物质生活的奴隶,正如那位运棋如神的老者,他以拣垃圾为生,“为棋不为生”的祖训使之在最低下的社会地位上保持着最自由的心灵,王一生对棋道的顿悟正是师法于这位以拣破烂为生的老者,并从他身上得到启示,决意摒弃物质生活的困扰,自觉地从下棋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因此王一生的精神气质中渗透着道家文化的精髓:率性而为,随遇而安,不事外求,不假人为,一切都自自然然,从不刻意贪求。庄子哲学的内蕴特别注重追求理想人格的建构以超越苦难的现实世界,而王一生也是一个极力维护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之人,和庄子的‘物物而不为所物’,“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的理想人格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他蔑视红卫兵的大字报,无视农场的纪律,只要不愁一日

三餐,便满山遍野去会天下“异人”,在混乱的时局中始终保持一个“局外人”的随意,这种漠视现实、追求超然忘我的解脱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由正是他不甘于苦难现实的挤兑,保持人的本色的原动力。

三、悟道叙述者看棋王

在悟道叙述者的眼中,王一生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境界的象征。

如果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谓“雅”的一面,而衣食需求则更多被视为“俗”,王一生则在意识和行动上自觉地完成了“雅”与“俗”的自然统一。棋呆子在种种可笑举止之下是他不为浊世所染的正气品格、不藏半点杂质和污垢的纯净内心以及持身谨严的人格力量:他对朋友真实、坦诚;他拒绝倪斌为他参赛所作的交换;在比赛最后赢得胜利时对老者提出和棋要求的应允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表现出一种正直的人格力量和执着的生命热力,这是其“雅”;而作为一个“人”,“生命”对于他也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维持和延续的,他在生存方面的务实态度又使他具有俗人的真实,文中曾用反语将他对“吃”的感受、看法以及吃态作了入木三分的描写,但这种调侃的语气随着我对王一生的理解逐渐转向温和直至认同,“我”和知青们在农场筹划安排的一盘蛇肉会餐就是对王一生在火车上“惨无人道”的吃相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肯定和模仿,其中对细节的操作和全心的投入直至把蛇骨吃得“一个渣都不剩”,无疑是“我”对于王一生吃相的首肯与实践,而后,当王一生离开农场时“我”对他可称是“情深意长”的叮嘱等等这一系列情节在无意中传达了“我”与王一生不同寻常的亲密,以前的不太认同已是烟消云散,好像两人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默契与缘份,而这种精神上的内在投合正是背后的叙事主体真正的意向,它通过叙述者“我”对于棋王的逐步认同得以自然的彰显。

小说的结尾,王一生在象棋大战中取得全胜,而在王一生下棋这场“大”赛的前前后后,叙述者“我”始终是最关注王一生的人,“我”先为王一生不能参赛而惋惜;后在王一生比赛中送水给他喝;最后,王一生赢了,他的“瘦小黑魂”形象在定格的瞬间终于使“我”找到了寻觅已久的人生意义:

>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意识到“人还是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的王一生在潜意识中同样存在着积极用世的儒家色彩,体现出儒家的务实进取精神,最后在与九名高手进行车轮大战时,完成了棋业中辉煌的一举,赢得了“棋王”之美称,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道”也因此少了一份玄虚味道,多了一种人间气息,从而达到一种儒道完美结合的境界,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力图阐释的,并非人与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凡而实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因世俗化而体现儒家的生存之道,因超越性而具备道家的处世之理,这其中所包含的深味的确让人回味无穷,并感应着我们对理想生存价值和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和思考。此时的“我”也终于成为一个悟道叙述者并最终与叙事主体的价值取向相融合,因此当王一生的故事结束时,小说并未因此而结束,作家节外生枝地在最后一段中又写道:

> 王一生已经睡死,我却还似乎耳边人声嚷动,眼前火把通明,山民们铁了脸,肩着柴禾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

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小说中的叙述者在顿悟人生哲理的同时,读者也随之能够体会到“我”在讲述王一生的故事这一表层结构下隐含着一个深层结构:叙事主体在面对惨痛的人生经历和恶劣的外部环境时对“活着”这一问题的不懈追索,并随着表层结构中“我”与王一生境界的相互融合而呈现出叙事主体的真正意图,小说最后“我拥了幕布,沉沉睡去”,这是“我”与隐含作者一起“理得”后的“心安”。

小说事实上是作为作者的叙事主体与作为读者的接受主体,通过文本这个中介而进行的一种对话,这决定了隐含作者在文本中的主体性,正是这种主体性操纵和影响着《棋王》表层结构中的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使文本具有一种内在的情感导向,而叙事主体所要呈现的价值取向又是通过“我”在文本中以常人,朋友和悟道者三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来理解王一生的过程得以实现的,因此小说的意义正是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互相作用的结果,小说叙事活动的实质首先是两者反复较量和互相征服的过程,而一部良好的叙事文本的产生就是这种较量与征服后所实现的平衡与和谐的结果,因此《棋王》中深层结构、潜在主角与表层结构、显在主角的完美融合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加了作品的魅力,使《棋王》具有更为深远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J].北京:文艺理论研究,1987,(2).

[2]　赵毅衡.中西小说的叙事方位[J].北京:中国比较文学,1989,(2).

[3]　罗　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From Irony to Identification——From Perplexity to Detachment ——An analysis of the mutual struggle and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narrated subject in‘Qi Wang’

LI Yan

(*Chinese depart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From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f the narrator (“I”), A Cheng, author of Qiwang, observes and narrates the protagonist’s ways of the Chinese chess and of the world, revealing gradually the orientation of value of the narrated subject in the deep structure through the process of‘seeking - and - realizing’the philosophy of life of the narrator“I”in the surface structure; thus, a perfect balance and harmony is achieved between the surface structure and the deep structure in their mutual contest, which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xt, adding strong readability to the work.

Key Words: narrator, narrated subject, deep structure